

新文學史料

2

語絲

新青年

LA JEUNESSE

青年雜誌



大陽月刊

一月號



創造季刊

光明

世界日報



說月報

新文学史料

第二辑目录

〔一九七九年二月〕

我要说的话周恩来 1

怀念郭沫若同志

郭沫若对鲁迅的评价洪丝丝 5

这是党喇叭的精神林林 7

——忆郭沫若同志

回忆郭老的一些片断赵 沅 15

记一次难忘的亲切会见方 殷 19

——忆郭老

忆郭老二三事唐 瑜 21

悼念·回忆·学习张悲鹭 24

——忆郭老二三事

深切的怀念 沉痛的哀悼林焕平 28

——写于惊闻郭沫若同志病逝之后

超过了死线的日子长谷川敏三 38

《屈原》在日本河原崎长十郎 40

日中的桥梁——沫若文库 40

回忆录

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生活之二茅 盾 43

商务印书馆(二)

一多牺牲前后纪实	高真口述 闻铭整理	55
鲁迅和陶元庆	钦文	70
纪念佩弦师逝世三十周年	季镇淮	86
——在清华大学党委举行的纪念朱自清先生 逝世三十周年座谈会上的发言		
从一九一九年到一九二七年五月出国	陈学昭	93
——回忆录(一)		
亲切的教诲	臧云远	108
——记一九三八年在延安毛主席接见时的谈话		
向死者告慰	王西彦	116
——记魏金枝		
回忆阿英同志	凤子	130
鱼饵·论坛·阵地	萧乾	132
——记《大公报·文艺》，1935—1939		
我与鲁彦	许杰	148
老舍在北碚	萧伯青	152
关于太阳社	任钧	156
中国诗歌会	王亚平 柳倩	162
回忆《野草》	秦似	170
忆爸爸——黄谷柳同志	黄燕娟	175

传记·自传

大时代中一个小人物的侧影	黄药眠	179
——自纪篇		
自传	黄谷柳	193

闻一多传(二)王 康 197

鲁迅研究

祝福书钦 文 210

鲁迅与任国桢锡 金 217

——兼记与李秉中

鲁迅赠日本友人诗孙席珍 223

访问记

周扬笑谈历史功过赵浩生 228

关于“两个口号”问题

需要澄清一些事实茅 盾 243

有关一九三六年周扬等人的行动以及鲁迅提出

“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的经过冯雪峰 247

书 简

萧红书简辑存注释录(一).....萧 军 259

中国戏剧运动

回忆左翼戏剧家联盟赵铭彝 278

轶闻轶事

郭老为《保卫芦沟桥》的战斗性题词魏绍昌 27

郭沫若鬻字例魏绍昌 23

出奇制胜纪 泽 42

从曹禺主演《财狂》说起佟 荔 287

谣言终是谣言	萧伯青	289
《面子问题》手稿的故事	小 济	155
鲁迅先生出殡那天的两件事	马 宁	290

国外书讯

《梦的道路——何其芳诗文选》	文浩若	292
《曹禹所受的西方文学的影响》	文浩若	293

简 讯

郭沫若同志文学著作单行本今年内陆续重印出版	伍 书	37
《中国文学家辞典》现代第一分册出版	于 言	85
北大“五四”文学社恢复活动	闻 涉	291

悼 念

阿英同志追悼会在北京举行		295
著名作家赵树理同志骨灰安放仪式在京举行		295
魏金枝同志追悼会上由他女儿所致的悼词		296
郑君里同志骨灰安放仪式在上海举行		298
广东省文艺界举行追悼黄谷柳同志大会		299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翻译家曹葆华同志病逝		300

题头篆刻	周哲文	
------------	-----	--

我未说的话

周恩来

为纪念郭沫若先生创作生活满二十五年，并庆祝他的五十生辰，我原打算写一篇专文献给他的。这个志愿立了好久，五个月前，我还拿了他的一部分著作，想在乡居期间，读他几本，然后好写出一篇有根据的文章来。不料今年夏天，敌机轰炸的次数特别多，人又病，事又忙，不仅文章没做，书也没读。时间是一天天的过去，书因为别人要读，也还了主人，可是，我的文章却依然没做。时间更一天天的逼紧，许多朋友的纪念诗文，也拿来读了，许多报纸的庆祝诗文，也提前发表了，于是使我志愿要做的文章几乎转成了急待偿还的文债。这一急，直临到郭先生生辰的前夕。这一急，直临到纪念日特刊发稿的最后关头。可是我面前铺着的依然是一张白纸，打破了我一向做文的惯例，然而我却决不能以偿债的心情，来做献给郭先生的纪念文章。

最后关头终于突破了，书既不能读，专文也不能写，但是临着这个日子，我却不愿“无言”，我还是说我平常所常说的话语！

在朋友中间，在文坛上，通常喜欢将鲁迅和郭沫若相提并论。这原是一件好事，而且是应当做的事，可是有时候也成为多事。多事就是将无作有，将小作大，张冠李戴，歪曲事实，甚至分门别户，发展成为偏向，这便不应该了。

要并论鲁迅和郭沫若，我以为首先要弄明两人的时代背景和两人的经历，是多少有些不同的。

鲁迅的时代，是一半满清，一半民国的时代。他出身于破产的士大夫家庭，他受过封建社会很深的洗礼，他受过戊戌政变后的洋务教育，嗣后，留学东洋，又受教于章太炎先生，并参加了光复会。入民国后，他又做过多年北方官僚社会的小京官，也可说是

闲差事。直到“五四”的前夜，他才得参加思想革命的运动，这就是新文化运动的骨干。从此以后，他就公开的成为宗法社会的逆子，士大夫阶级的叛徒，逐渐养成他在新文化运动中的领导地位，可是他自己却又那样谦诚的愿意做一个“革命军马前卒”。瞿秋白同志说得好：“鲁迅从进化论进到阶级论，从绅士阶级的逆子贰臣进到……群众的真正的友人，以至于战士，他是经历了辛亥革命以前直到现在的四分之一世纪的战斗，从痛苦的经历和深刻的观察之中，带着宝贵的革命传统到新的阵营里来的。”（瞿秋白：《鲁迅杂感集序言》）所以毛泽东同志说：“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蔡子民先生也说：“为新文学开山的，有周豫才先生，即鲁迅先生。”（蔡元培：《鲁迅先生全集序》）鲁迅所努力的，拿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鲁迅：《坟》）这就是鲁迅为大众而牺牲的精神。他自己愿做“桥梁中的一木一石”（同前），其实他就是这过渡时代的伟大桥梁。

郭沫若的时代，却稍为异样了。他虽在少年时代，也是关在四川宗法社会里面的，但是二十岁以后，他走出夔门，几乎成为无羁绊的自由知识分子了，虽然他也如同时代的知识分子一样，过着贫困和流浪的生活。他的半商半读的家庭，虽也给他一些影响，但是三十年来大时代所给予他的影响，却有着异常不同的比重。就拿经历说，他既没有在满清时代做过事，也没有去北洋政府下任过职，一出手他就已经在“五四”前后。他的创作生活，是同着新文化运动一道起来的，他的事业发端，是从“五四”运动中孕育出来的。我们不能把郭沫若看成是前一辈子的人，而应看成是我们这一辈子的人，虽然他比鲁迅也不过只小了十一岁。我们也不能把郭沫若看成是两个时代的人物，而应看成是新文化时代的人物，虽然他在少年时代也曾舞文弄墨过一番。

因此，我说：郭沫若创作生活二十五年，也就是新文化运动的二十五年。鲁迅自称是“革命军马前卒”，郭沫若就是革命队伍中人。鲁迅是新文化运动的导师，郭沫若便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鲁迅如果是将没有路的路开辟出来的先锋，郭沫若便是带着大家一道前进的向导。鲁迅先生已不在世了，他的遗范尚存，我们会愈感觉到在新文化战线上，郭先生带着我们一道奋斗的亲切，而且我们也永远祝福他带着我们奋斗到底的。

从这样观点出发，自然在并论鲁迅和郭沫若的时候，便不会发生不必要和不应有的牵连和误会了。

鲁迅先生在思想斗争和新文化运动上之非常可宝贵的革命传统，秋白同志在《鲁迅杂感集序言》中已经指出四点：第一是最清醒的现实主义，第二是“韧”的战斗，第三是反自由主义，第四是反虚伪的精神。这都是非常之对的，我在这里不想再多说了。要说的是郭先生在新文化运动二十五年当中，所给予我的印象和我所认识的特点是什么？

第一是丰富的革命热情。郭先生是革命的诗人，同时，又是革命的战士。他心中笔

下充满着革命的愤火，也充满着对于人类的热爱。当“五四”觉醒时期，当创造社革创时期，他的革命热情的奔放，自然还带着很浓厚的浪漫谛克；这正是当时知识青年的典型代表。但是经过前一次大革命炉火的锻炼，经过十年海外的研究生活，他的革命热情已经受了革命理智的规范，然而他内在革命烈火，却决没有消失，相反的，愈蕴藏便愈丰富。一旦抗战号响，他便奔回祖国，他的革命热情，也就重新爆发出来了。四年多抗战，不论在他的著作上，在他的行动上，都可看出郭沫若仍然是充满着革命热力，保有着当年热情的郭沫若。可是时代究竟不同了，客观的事实不断的教训着我们充满了革命热情的郭先生，于是郭先生有时竟沉默起来了。革命的现实主义久已代替了革命的浪漫谛克主义，郭先生已到“炉火纯青”的时候了。

第二是深邃的研究精神。有人说学术家与革命行动家不能兼而为之，其实这在中国也是过时代的话，郭先生就是兼而为之的人。他不但在革命高潮时挺身而出，站在革命行列的前头，他还懂得在革命退潮时怎样保存活力，埋头研究，补充自己，也就是为革命作了新的贡献，准备了新的力量。他的海外十年，充分证明了这一真理。十年内，他的译著之富，人所难及。他精研古代社会，甲骨文字，殷周青铜器铭文，两周金文以及

古代铭刻等等，用科学的方法，发现了古代的许多真实。这是一种新的努力，也是革命的努力，虽然有些论据，还值得推敲。如果说，连卢那察尔斯基都不免在退潮时期入了迷路，那我们的郭先生却正确的走了他应该走的唯物主义的研究的道路。现在郭先生似乎又清闲了，恰好为纪念他的二十五年创作生活，大家主张集资建立沫若研究所，我想这是最好不过的事。复活过去的研究生活，指导这一代青年，提倡起研究学习的精神，



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庆祝郭沫若同志创作生活二十五年和五十岁生日，大笔是生日礼物。

以充实自己，以丰富我们民族的文化，郭先生，现在是时候了。

第三是勇敢的战斗生活。郭先生是富于战斗性的，不仅在北伐抗战两个伟大的时代，郭先生是站在战斗的前线，号召全国军民，反对北洋军阀，反对日本强盗和逆伪的；便在二十五年的文化生活中，郭先生也常常以斗士的姿态出现的。正因为这样，他才能成为今日革命文化的班头。也正因为这样，初期创造社才能为革命文学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才影响了后期创造社在思想意识上的一些论争。自然后期创造社的争论已多少表现着“文人的小集团主义”（秋白语），可是鲁迅先生也说：“我有一件事要感谢创造社的，是他们‘挤’我看了几种科学底文艺论，明白了先前的文学史家们说了一大堆，还是纠缠不清的疑问。……以救正我——还因我而及于别人——的只信进化论的偏颇。”（《三闲集序言》）同时，这里必须为周郭两先生辩白的，他们在北伐期中，谁都没有“文人相轻”的意思，而且还有“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事实。周先生在《两地书》（六九）中明说：“其实我也还有一点野心，也想到广州后，……第二是与创造社联合起来，造一条战线，更向旧社会进攻，我再勉力写些文字。”在广州发表的文学家宣言，周郭两先生均列了名的。广州事件后，郭先生曾邀鲁迅先生参加创造刊物，列名发表宣言，不幸因新从日本归来的分子的反对联合，遂致合而复分，引起了后来数年两种倾向斗争的发展。这从“切磋”的观点上看来，未尝不是一件有收获的事，但是，因此而引起许多不必要的误会和无聊的纠葛，一直影响到在鲁迅晚年时候的争论，那真是不应该的了。有人说，鲁迅先生“韧”性的战斗多表现在他的著作上，郭先生的战斗性，多表现在他的政治生活上，我想，这种分法，并不尽当的。因为一个人的战斗性是发源于他的思想性格和素养的，文字和行为，不过是他的表现的方面罢了，并不能说这是差别的所在。真正的差别是鲁迅先生韧性的战斗，较任何人都持久都有恒，这是连郭先生都会感到要加以发扬的。

这些，也就是郭先生在革命的文化生活中最值得提出的三点，也就是最值得我们大家学习的三点。

我这不是故意要将鲁迅拿来与郭沫若并论，而是要说明鲁迅是鲁迅，郭沫若是郭沫若，“各人自有千秋”。

鲁迅先生死了，鲁迅的方向就是大家的方向！

郭沫若先生今尚健在，五十岁仅仅半百，决不能称老，抗战需要他的热情、研究和战斗，他的前途还很远大，光明也正照耀着他。我祝他前进，永远的前进，更带着我们大家一道前进！

民国卅年十一月十六日晨

（原载1941年11月16日重庆《新华日报》）

郭沫若对鲁迅的评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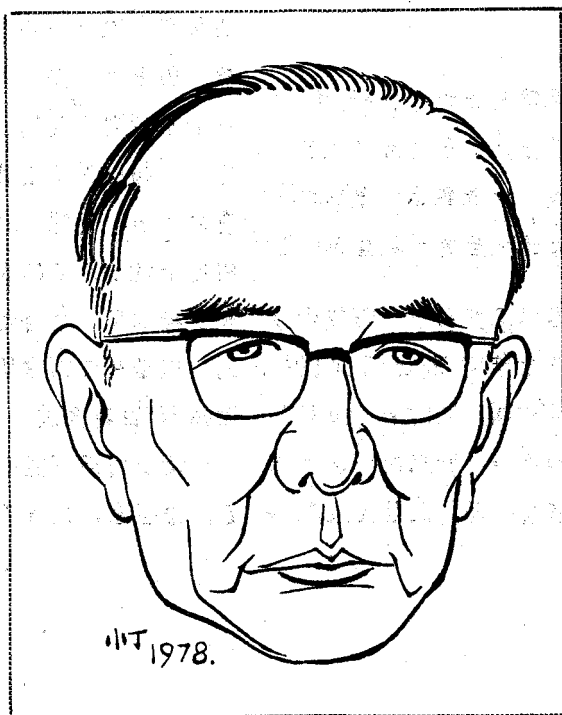
洪丝丝

一九三六年秋天正是中华民族危机十分深重的时刻，鲁迅逝世的消息象一声闷雷传到了东京。在东京倾向进步的中国留学生听到这个噩耗，心情非常沉重，随即举行一个追悼会。

当时郭沫若旅居在东京附近的千叶，很多人热烈盼望他能够参加这个追悼

会。他没有辜负大家的期待，特地赶到东京来了。

在日本法西斯统治的恐怖气氛里举行这样的群众集会是很不容易的，要找到一个适当的会场就难于上青天，结果是几百



郭沫若像 丁聪画

人站在一个类似教室的地方，挤得水泄不通。会场没有什么布置，仪式也十分简单，但是有了郭沫若参加，分量就显得很不寻常了。

郭沫若参加这个追悼会是冒着风险的。他不但受到日本警探的监视，也受着国民党特务的窥伺。有一次，他在东京对中国留

学生演讲，就受到国民党特务的捣乱，幸亏进步的留学生群众挺身而出保卫，才免于遭到毒手。他这次冒险来参加追悼会，可以说明他尊敬鲁迅的深情厚意。

当时人们已经知道鲁迅和郭沫若的政

治大方向一致，都拥护毛主席关于建立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但是熟悉文坛掌故的人，有的总忘不了创造社同鲁迅的论争，忘不了创造社的人过去对鲁迅的看法，例如“醉眼朦胧”之类的评语。因此，在追悼会将要举行的时候，有人悄悄地猜测郭沫若对鲁迅将作怎样的评价。

随着一阵热烈的掌声，郭沫若在追悼会上讲话了。他热情洋溢地赞美鲁迅，在讲话结束的时候提高声音说了下列几句对鲁迅的评价(大意)：

从前有人歌颂孔子说：大哉孔子！孔子之前未有孔子，孔子之后亦无孔子。我们可以说：大哉鲁迅！鲁迅之前未有鲁迅，鲁迅之后有无数鲁迅！

这一段结束语当然又博得了一阵热烈的掌声。记得一九三七年郭沫若回国以后，在纪念鲁迅逝世一周年的时候还重复了“大哉鲁迅”这一句赞语。看来他作这个评价不是由于一时感情冲动，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听了郭沫若追悼鲁迅的讲话以后，我不禁想起杜甫对李白的赞语：“白也诗无敌。”但是我没有意思把郭沫若比作杜甫(郭沫若对杜甫有他的看法，而我对他的看法是不以为然的)。这里只是要说明在毛主席公开称誉鲁迅“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之前，郭沫若也肯定鲁迅的伟大在中国文化史上是“前无古人”了。

郭沫若提出的“鲁迅之后有无数鲁迅”的预言，我以为总有一天会成为现实。当然，历史上的伟大人物总是各有千秋的，不会象荣宝斋复制出来的古画那么酷肖原作。正如史学家赵翼所说的那样，“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鲁迅毕竟是将近半世纪以前的人物，现在要求出现完全一样的第二个鲁迅，那分明是不切实际的。但是在中国这块伟大的土壤，真正贯彻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在一个历史时期可能产生无数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这该不是幻想吧。

1978. 11. 28 于北京。



这是党喇叭的精神

——忆郭沫若同志

林林

近年来，因为知道郭老的身体欠安，惦念着他，就在我家的墙上，挂着他于一九三七年夏在上海时写给我的条幅，这条幅，经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动荡的漫长的岁月保留下来的，写的是他由日本回来时在外轮船上于七月二十七日清晨作的《归国杂吟》的一首诗：

此来拚得全家哭，今往还将遍地哀。
四十六年余一死，鸿毛泰岱早安排。

那时他刚刚回国，英姿英发，信笔一挥，生气勃勃。看着它，总受到教益和鼓舞，寥寥只是二十八字，却解决了两大主题，公私问题和生死问题。多年来，我是崇敬郭老的“安排”，而学习他来勉励自己。

现在，郭老和我们永别了。我和全党、全国人民一样悲痛。我一向把他当做师长，是得到他的提携而成长起来的。在悲痛中，一幕一幕的回忆，在我的脑海里，象一阵又一阵的波浪冲击着。

一 关心“左联”的工作

约在一九三五年夏，在日本，我被东京“左联”同志指定和郭老联系，主要是请教他关于文艺活动问题和要求写些文稿。当时晓得郭老的时间很宝贵，他在做研究并写书，靠一管笔养活七口之家，但他关心我们的文艺活动，并热诚给以帮助。

郭老对“左联”青年朋友是以同志看待的，年轻人的意见，也虚心听取的。那时，我们工作贪多，一下子办了三个刊物——《杂文》、《东流》（主要发表小说）、《诗歌》（后改为《诗歌生活》在上海出版）——郭老都给予有力的支持，经常给稿，并鼓励青年文艺工作者。《杂文》因还登有国内鲁迅、茅盾的文章，引起反动当局的注意，出了三期就被禁止了。郭老和我们商量改为《质文》，并在《质文》发表他的小说《骑士》。后来《质文》又被日本警察禁止。郭老建议到上海继续出版，因刑事（便衣警察）搜查过我的宿舍，大家同意让我回上海执行编务。在上海

出了二期，又被上海国民党反动当局勒令停刊了。当时《质文》社编辑了“文学理论丛书”，他带头翻译马克思的论文，书名《艺术作品之真实性》。这丛书在上海光明书局出了十册，在国内读书界是颇有影响的。

二 生活俭朴

我初次到千叶县市川市须和田郭老的住宅，请他出席一个文艺聚会，指导我们的工作，他一下子就答应了，当即脱了和服穿上西服，和我一齐离家坐火车到东京，在御茶之水站下车出站。在大街上，出租汽车有的是，一招手就来，到目的地，只不过花四毛钱。我要叫出租汽车，他不愿意，说：“走罢！你比我年轻。”我原以为免在大街暴露，也可以节省点时间，但他这一说，我只好照办了。到了聚会的地方，他和青年朋友交谈，答复人家的问题。接着在那儿吃便饭，他讲得多，吃得慢，还有半碗饭，可是桌面没有菜了，只剩半大碗汤，我们要去添菜，他不肯，就把那半碗汤倒进自己的饭碗去，草草算是吃饱了。那时候，我从心里感到，郭先生是这么平易近人，生活是这么俭朴的啊！

三 花木的知识

再一次，我到他的住宅，他叫我到室外走走，他穿着和服，背着最小的孩子（即郭志鸿），陪我在院子散步，院子有株大山朴，那是常绿乔木，叶子象枇杷，夏

天开花象白莲。园地又有一片鹦哥红，开起花来满地红。之后又带我走出家门外，野外有些花木，郭老问我，这是什么花？我答不出；又问那是什么树？我又答不出。他就告诉我那是什么花，那是什么树，并说学文艺固然不只是弄花鸟虫鱼，但对植物知识还是要懂些好。当时，我有些惭愧，也有些感激。是的，他所写的散文，不少用花木命题，如芍药、山茶花、银杏、英雄树……等等，文章显得更生色，引人兴味。

一九五九年，郭老出版了一册《百花齐放》的诗集，又配了木刻，这表示他对文艺界欣欣向荣的喜悦心情。在这里，我真佩服他对花木的知识之广，这诗集是写出一百零一种花的性格，可见他是经过长期的知识的积累，同时，也向园艺部门同志进行访问了解，才能写出这诗集来的。

四 拟译《资本论》

郭老于一九二八年春写的文艺散论《桌子的跳舞》，是受到《资本论》里面的脚注启示写的，他研读马克思著作是很早的。

在“跨着东海”之前，曾想翻译《资本论》，因为商务印书馆不愿承印，只好作罢。一九三五年，又产生翻译《资本论》的动机，但须先有一笔收入维持生活，才能进行。一天，他询问我在日本可有多少读者？意思是看我们可以征求多少订户。当时，我就说，“《资本论》是大部头的书，翻译出版要花时间，东京的留学生读者，流动性较大，条件还不够。”他听了觉得有

理，译书的事就“断念”了。但他仍然继续研读《资本论》，一九三六年秋写了《资本论中的王茂荫》，纠正了中日有名的翻译者对王茂荫这姓名的误译，并解释书中所说的“宝钞”，是怎么的一回事。

五 支持《留东新闻》

《留东新闻》，它是个周刊小报，由早稻田大学几个四川省同学主办的，有一天他们找我帮助编辑文艺稿，我想，怎么会找我来呢？原来是郭老介绍的。郭老支持《留东新闻》。这刊物真大胆，把当时蒋经国在苏联时写的骂他老子蒋介石的文章，从日文杂志翻译过来刊登了。蒋介石当时欺骗人民，提倡新生活，采用孔老二的许多好字眼，什么仁呀、义呀的，蒋经国逐条举例驳斥。记得他还骂他老子蒋介石虐待他母亲，把他母亲从楼上打翻到楼下，是个不仁不义的坏蛋，等等。这篇文章，引起广大读者很大的注意。不用说，蒋经国后来又跑到他父亲大人的膝下悔过了。

郭老在日本，受刑事、警察的监视，也受国民党反动派的捣乱。一九三五年十月初，东京中华基督教青年会邀请他去做一次公开的演讲，题目是《中日文化的交流》，讲到快完了的时候，居然有坏家伙向讲台上扔苹果，引起了一阵骚乱，但也引起大家极大的关心。郭老当时神态自如，相信群众。按他说，一千多人的听众当中百分之八十是关心他的。在那一阵骚乱中就近

挺身而出的早稻田大学同学的杨凡和朱洁夫等人，保卫郭老安全上了汽车离场的。

六 提倡新文字

一九三四——一九三五年，鲁迅在上海写了提倡新文字的文章。郭老在日本也予以呼应，于一九三六年二月也写《请大家学习新文字》的文章，投给在东京出版的《东流》发表。劝大家快学快用，并说，读并不费事，写就吃力些，因为自己的发音和标准的拉丁化发音不一定相同。

郭老写了六篇历史故事，《孔夫子吃饭》、《孟夫子出妻》、《楚霸王自杀》等等，书名叫《豕蹄》（意是从“史题”转为“史蒂”），就由一个年纪很轻的女同志李柯（任白戈同志的爱人）附上新文字译文一起刊行的，这还是一种创举，用意是要做做宣传，也提携了年青人。那时候，他还和一批搞新文字的青年如张翼同志等有所接触。

张翼同志是潮州人，和我一样说福佬（闽南人）话，这种话保存大量的古音。郭老为着查考一些词汇，如“刺身”（Sashimi，日本人吃的生鱼片）、“三弦”之类，也曾向我们了解，来证明日语的发音与中国古音的联系。

七 写“国防文学”的文章

约在一九三六年春，当时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的火药味够浓了，在东京市街上见到坦克车不断在游行，大家心里是有

数的。我从国内寄到神保町青年会（这里人杂、邮件多）的书报里，得到印在淡红色纸张上的《八一宣言》，是党在号召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要求组织抗日联军，成立国防政府，等等。暗中兴奋地看了，我就把它带到须和田郭老住宅，请他也看了。很久没有得到党的消息了，他当然是很兴奋的。看后跟我说些话，现在我记不起了。

后来，我们“左联”任白戈同志等商量要我请郭老写关于“国防文学”的文章。开始他对“国”字有所犹豫，国是蒋介石在统治着的，他曾发表过揭露蒋介石反革命的面目的文章《请看今日之蒋介石》，在国内外有很大的影响。他对蒋介石是够憎恶的了。但经过几天的思考，体会到宣言的中心思想，民族矛盾超过了阶级矛盾，“国”是被帝国主义欺侮、侵略的“国”。我再去看他，他对我表示愿意来做党的喇叭。党的喇叭，这话多么有分量，多么的响亮！在六月十四日写好的《国防·污池·炼狱》，就是解释不该害怕堕入“爱国主义的污池”！这是针对当时还有关门主义、宗派主义思想的人说的，认为不好带白手套干革命，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能有洁癖。文章说道，“这是一座炼狱，要想游乐园的人非经过此间锻炼不可”。我把这篇文章寄给上海的朋友，就在《文学界》第二期发了。接着他又写了《在国防旗帜之下》、《我对国防文学的意见》、《蒐苗的检阅》等文，旗帜鲜明，立场坚定，是充满爱国救亡的热情，忠心执行党的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这是适应时局的变化而定的决策。

关于这口号，当时和后来引起了风波。别的问题与郭老没有什么关系，暂且不谈，单单就“国防文学”这口号本身来说，我们必须好好学习毛主席《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这篇光辉的文章，特别是其中提到“国防教育”的主要内容。以我的理解认为“国防文学”口号是正确的。如果说一九三六年这口号本身有错误或缺点，那么如何对待一九三七年毛主席所提的“国防教育”？在理论上怎么说得通呢？此外还有人说，这口号是资产阶级的口号，这也不能服人，当时大资产阶级蒋介石采取“宁与友邦，勿与家奴”的政策，是“攘外必先安内”，有“国”不“防”的，他们能提出这个口号吗？

郭老当时身在日本刑事、警察监视之下，提出“国防文学”的口号，是冒风险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翌年七月只身秘密地离日回国，投入抗战的行列，又深刻揭发国民党反动派的卖国投降政策。怎么能说这口号是投降主义的呢？脱离当时实际的具体环境，随便下结论，这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罢？

八 两次鲁迅纪念会

在我的印象中，郭老参加鲁迅纪念会的次数是非常多的，每次都给鲁迅很高的评价，纪念文章也写得不少。从在市川市听到鲁迅逝世那天（十月十九日）夜间就连忙写追悼文，说鲁迅是我们中国民族近代的一个杰作，把鲁迅与高尔基相提并论。

十一月初又写《不灭的光辉》，赞扬“鲁迅始终是为解放人类而战斗一生的不屈的斗士，民族的精英”。

至今回忆起来，我非常懊悔，由我请郭老参加的两次鲁迅逝世纪念会，都由于疏忽，没有安排记录，未能留下文章来，这真是无法弥补的损失。

第一次，一九三七年十月间，鲁迅逝世周年纪念，那时抗战已经开始，郭老从日本才回到上海二三个月，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戴平万、林淡秋、梅益等同志，要我邀请郭老到鲁迅逝世周年纪念大会讲话，我就给郭老说了，他当然应允，并对我说，“我又得说鲁迅的好话”。那天到会的群众很多，郭老的演讲，博得不断的掌声。下了讲台后，在院子里，群众就久久围拢着他，要求他签名留念，很不容易脱身。

第二次，一九四八年郭老已从重庆来到香港，暂住在九龙山林道一幢楼上。当时又逢鲁迅逝世纪念日，香港文学组织负责同志，要我请郭老出席讲话，我就到他家里说明来意，郭老问我，你们大伙儿打算怎样纪念鲁迅？我答说，我们商量这次纪念鲁迅主要联系当前反蒋的解放战争，说明四点，一是什么，二是什么，把四点内容说了一遍，他留心地听着。我说，这只供先生参考，先生还是发挥您自己的见解。

从九龙渡过海，到了六国饭店大厅会场，群众大都来了，不免打打招呼。郭老走到我身边来了，低声对我说，“你对我说四点，我只记住三点，还有一点忘记了，你再

说一下。”我没有想到先生这么认真，就把他忘记的那一点告诉他，以为这就了事了。殊不知到了会议就要宣布开始之前，他因和朋友打招呼，又忘记了那一点，又跑到后座的地方来问我，那时我又说一遍，心里十分后悔不应该不写个字面给他，但我当时却没有想到他一定要照我们那四点来讲。

郭老讲话了，他照着四点逐点发挥，非常切合当时的政治和思想的情况。当时参加纪念会的同志，当能回忆起那次激动人心的演说。之后，我和有关同志谈了郭老如何尊重组织决定的意见，我认为这又是党喇叭的精神，大家听了极为感动，更是敬爱他，更要向他学习。

顺便说一下：一九七一年十月初，有个法国朋友露亚夫人访华要求见郭老，向郭老表白她要研究中国近代文学，要从郭老研究起。郭老听了后，就以谦虚的态度和无私的精神，恳切地劝她去研究鲁迅。这位夫人听郭老的话，编译出版了鲁迅杂文选、回忆录等书，颇有成绩，工作仍在进行。她听到郭老逝世的消息，就从法国寄来很有感情的唁信。

九 要悲壮，不要感伤

上海沦陷后，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郭老坐外轮秘密离开上海到香港。于十二月中坐轮船到广州。在船上，恰好有个音乐工作者刘雪庵，他碰到郭老，喜出望外，就将他写韵的表现东北人民流浪惨景

的歌曲，唱给郭老听，请他指正，郭老就给他提了些修改的意见。郭老对那作品，说，“不要感伤，要悲壮，要激励人心，鼓舞人们的战斗热情”。

过后不久，我试写了一首抗战的抒情诗稿，请他指导，他看到诗里面有“战！战！”的句子，就发笑了，说“这不好念，节奏不好，要改”。指出诗歌要注意“情调”与“声调”的问题，诗与歌虽各有倚重，但情调和声调安排的好，可以增加诗的艺术效果。

十 参加群众游行

郭老隔了十二年又回到了广州，把华南文化界的抗战的火焰点得更旺起来了。广州文化界救亡协会的朋友，请他去演讲，记得是讲《武装民众的必要》。指出北伐时与上海抗战，民心的差别，有它的政治原因。要华南人民动员武装起来，防止敌人来犯，“保卫广东，保卫中国”。那是一次出色的演讲，听众一片沸腾。群众大会开完后，即列队示威游行，郭老被请去站在队伍前头的大横旗之下，群众齐声唱着广州话的“动员，动员，全国总动员”的歌，郭老随行列的歌声前进，经过长长的长堤，有时握着拳头跟群众一起喊口号。之后，石辟澜同志编的《新华南》杂志，封面就登了郭老带头示威游行的照片，这给华南青年们很大的鼓舞力量。

郭老到广州，是希望把在上海出版的《救亡日报》于一九三八年元旦复刊。经他

的努力，这工作有了着落，郭老写了复刊词《再建我们的文化堡垒》。复刊工作要夏衍、阿英二同志从上海来负责，阿英同志不能来穗，郭老是社长，叫我参加编辑部工作。因我们有党的领导，郭老信任我们，就把他的图章交给我们，由我们随工作需要而用他的名义，盖他的图章。他应召离开广州到武汉，后来担任政治部第三厅厅长的职务，但经常寄些评论和散文来。

一九三八年十月间，日军从大亚湾登陆，十四日夜已侵入广州东郊，那天我们还出最后一天报，当夜一点多钟听到枪炮声，夏衍同志带领我们在黑暗中离开报社，辗转到桂林。郭老也因武汉失守，经大火的长沙来到桂林，住在乐群社，安排三厅的事务，叫我要把恩来同志交代的一个重要文件三天内出版，印数还不少，说要带到重庆去，我把这工作办好了。郭老当然也在进行《救亡日报》复刊的工作。郭老那时因职务关系不能不去重庆。《救亡日报》终于在一九三九年正月初复刊，郭老为该报响应义卖，从重庆寄来一首诗，诗曰：

纾难家宜毁，临危命可捐。

苟能明大义，何用惜金钱。

十一 关于写中国文学史

一九四八年春，我因读过郭老的《论古代文学》、《屈原研究》等论文，感到很受教益，就建议他写中国文学史，他谦逊地说，“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是拓荒的工作。要是闻一多不死，他来写中国文学史